

钟叔河

千秋鑒借吾妻鏡

海豚出版社

千秋鑒借吾妻鏡

叔河白題



海豚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千秋鉴借吾妻镜 / 钟叔河著. -- 北京: 海豚出版社, 2015.10
ISBN 978-7-5110-2773-3

I. ①千… II. ①钟… III. ①散文集-中国-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34642号

总发行人: 俞晓群
责任编辑: 曹振中
美术编辑: 吴光前
责任印制: 王瑞松

出 版: 海豚出版社
网 址: <http://www.dolphin-books.com.cn>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
邮 编: 100037
电 话: 010-68997480(销售) 010-68998879(总编室)
印 刷: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及各大网络书店
开 本: 32开(889毫米×1194毫米)
印 张: 12
字 数: 174千
印 数: 1—5000
版 次: 2015年11月第1版,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110-2773-3
定 价: 42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重印序言

本书初版在《骆驼丛书》中，这该谢谢老友朱正，是我“伸着脖子让他拉”（原序中语）进去的，一转眼快三十年了。

全书十八篇，介绍了十七个人早期 from east to west 的二十种记述，从康熙时因海难获救遍历西洋的谢清高晚年口述《海录》，到光绪时随丈夫先后居留日本意大利的单士厘所作《癸卯旅行记》和《归潜记》，都很有一点看头。

这些记述，都成了《走向世界丛书》一九八〇年初面世的单行薄本，十八篇原是各本的前言。

那时刚恢复工作，急于出书，只想能多有几个人来读这些“写西洋的古文”。所以十八篇都写得比较“散”，比“文”，也比较短，都不过几千字。尤其是开头十篇，

分节处以“××”隔开，小标题也没有加，完全是随笔的写法。

但歪打正着，这些单行薄本倒一炮打响，很快便被大家接受了。

丛书列入了国家规划，随即重印，精装合订，前言却开始面临“学术化”、“规范化”的压力。黎澍先生叫将新写的前言先交《历史研究》发表，便建议勿再以“在第一面飞舞着的龙旗下”这类文句为题。“学术文只要学术性，不要文学性。”他说。

于是，《历史研究》首刊的《论郭嵩焘》便长达四万言，有史料有考证有论说，还有引文有注释，像模像样地成了学术论文，丛书全文转载，标题还是《论郭嵩焘》。这十八篇，新版也全都照此“规范”改写，学术性增加了多少不好说，字数则从原来的共计十五万字增加到了三十三万字，翻了一倍多。前言也改称叙论，加上新写的七篇，成为另一本四十六万字的新书——《从东方到西方：走向世界丛书叙论集》，一九八九年出版，二〇〇二年又重印了一版。

如今本书亦将重印，若持与叙论集相比，从黎澍先生的角度也就是学术性的角度看，叙论集也许居先，至少文章长些材料总会多些；从我们普通人的角度也就是可读性（文学性不敢说）的角度看，则本书可能更胜一点吧，我想。

二〇一五年八月三十日，钟叔河于长沙

[附记]“千秋鉴借吾妻镜”是黄遵宪的诗句，意谓史书和史事可作千秋万世的借鉴。《吾妻镜》为日本古史书名，即《关东通鉴》。传说武尊皇子东征渡海，风涛大作，有橘姬投海祷神得止。及凯旋，皇子东望叹曰，“吾妻独不能归乎”，后人遂称关东为“吾妻国”。东京又有“吾妻桥”，亦一名胜古迹。

目 录

i	重印序言
1	两千年岁月，五万里行程
17	远东人对泰西的第一印象
37	在第一面飞舞着的龙旗下
59	为西学东渐而奋斗的一生
77	最早的世界博览会游记
88	一位技术专家走过的道路
109	待凭口舌巩河山

- 129 主张开放是为了进步
- 148 走遍世界去尝百草
- 164 海云凝望转低迷
- 183 一个同文馆学生的观察
- 205 巴黎公社的目击者
- 226 曾经沧海，放眼全球
- 257 用夏变夷的一次失败
- 283 一卷西洋风俗图
- 303 千秋鉴借《吾妻镜》
- 327 老来失计亲豺虎
- 353 从闺房到广大的世界

两千年岁月，五万里行程

《海录》和《乘槎笔记》

哥伦布以前，海洋环绕的亚欧大陆，就是人们心目中的整个世界。中国在极东，欧洲在极西，隔开五万余里；相互而言，都是“远在天边”的“世界的尽头”。

那时候，在世界上旅行是不容易的。庄子《逍遥游》描写鲲鹏变化，“水击三千里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”，真是汪洋恣肆，将想象力发挥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。可是，当笔锋转向人间世时，连他也不能不如实地承认：“适百里者宿舂粮（去百里外的地方，得在先天晚上预备干粮），适千里者三月聚粮（去千里外的地方，得提前三个月准备口粮）。”这就是当时出门旅行的实际情形。

然而，人决不会永远甘心被局限。人们总是希望自己的世界变得宽大一些、丰富一些，希望能够了解别处的情形，得到别处的经验。于是，随着贸易和财富、国家和权力的出现，就有了长途转运的商人，有了交通联络的使者，有了走向世界的旅行家，也有了对于远方外国的好奇和希望。

关于西方世界的情形，中国在远古就有过不少传说，如周穆王会见西王母之类。可靠的史料，至少可以上溯两千年。但直到一百几十年前，才有人亲自到欧洲记下自己直接观察的结果——这就是《海录》和《乘槎笔记》，在此处合印为一册的两部书。

x

x

《海录》由一位盲人于一八二〇年口述，经别人笔录整理而成。《乘槎笔记》则是一八六六年开始到欧洲游历的人的日记。论出世，《海录》在《乘槎笔记》之前；论内容，《乘槎笔记》却在《海录》之上。

《海录》的口述者谢清高，广东嘉庆州（今梅县）人，年轻时在海上遇险，被外国商船救起后，留在船上工

作。此后十四年中，他遍历南洋、印度和欧洲；后来回国，不幸失明，在澳门以口译为生。他的乡人杨炳南，听到他所谈海外各国的事情，多为过去书籍所未载，觉得很有价值，于是将其记录整理成书，刊行于世。此次据《海山仙馆丛书》和《小方壶斋舆地丛钞》两本校勘，酌予分节标题，并重订目录。

《乘槎笔记》的作者斌椿，是一位老年满族官员。他出身汉军旗，当过知县，能文能诗，关心时事，跟地理学家徐继畲、大数学家李善兰等是朋友。同治三年，他被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”所属“总税务司”英国人赫德请去“办理文案”，开始接触洋务、洋人。同治五年，总理衙门派同文馆学生出洋游历，需要一位“老成可靠之人率同前去”。六十三岁的斌椿担任了这个差使，“身之所至，目之所见，排日记之”，后来整理刻印，以《乘槎笔记》书名传世。此次据原刻本校点排印，除二月十八日记新加坡土人删去四十字，四月二十三日赴英王宴舞宫会宴感想删去二十九字外，完全保持原貌，只增加了月份标题和目录。

在《海录》和《乘槎笔记》之前，中国人关于欧洲的记述，全部得自传闻，从来没有过直接观察的第一手材料。这两部书一前一后，跟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相距不过二十年，正值中国人从闭关锁国状态中惊起，开始面对剧烈变化的世界之时。它们标志着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，是中国人走向世界的又一块里程碑。

经过了两千年岁月，才终于从东头走到西头，走完这五万余里行程；这真是一个漫长的时间，一条漫长的道路。

x

x

中国人最早得到的西方的信息，记在司马迁（公元前一四五至前八六？年）的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里，云汉朝向西方派出的使者，最远曾到达罗马帝国亚洲属地的东陲；接着安息（今伊朗）使者随汉使来中国，带来了“黎轩善眩人”（罗马的表演魔术的艺人）。据杜佑《通典》记载，艺人共有二位，“皆蹙眉峭鼻，乱发拳须”（粗眉毛，高鼻子，卷曲的头发胡须），无疑是欧洲人。

欧洲古时称中国为“赛里斯”（希腊文Εἰηες，拉丁文Seres）。这个名称是从“丝”字派生出来的，因为中

国是产丝之国。罗马学者白里内（公元二三至七九年）的《博物志》说：“赛里斯人林中产丝，织成锦绣文绮，贩运至罗马。……由大地东端运至西端，故极其辛苦。”可见早在二千年前，中国和欧洲之间就已经有了一条“丝绸之路”。中国商人并未到过罗马，却频繁地接触着从事贩运的中亚和西亚的“胡商”。在这条路上来往的商人和使者，把辗转传闻的一些消息带到了东方，比如：

大秦国贡花蹄牛，其色驳，高六尺，尾环绕其身，角端有肉，蹄如莲花……迹在石上，皆如花形……（《别国洞冥记》）

大秦国地方数千里，有四百馀城，小国役属者数十。以石为城郭……宫室皆以水精（晶）为柱……有夜光璧、明月珠、骇鸡犀……有飞桥数百里，可渡海北诸国……（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）

这些传说，有的真实可信，有的则正如《后汉书》作者范曄自己所说，“譌怪多不经”。这是缺乏直接观察、全凭道听途说不可避免的毛病。

X

X

魏晋以后，宗教盛行，志怪、传奇，蔚为风气，西方

来的传闻往往更蒙上了一层怪异的色彩。

唐人张说的《梁四公记》，述梁武帝时有四个老人来中国，给“诸儒”讲述西方奇事，说拂林国（即罗马）“岛西北有坑，盘坳深千馀尺，以肉投之，鸟衔宝出，大者重五斤，彼云是色界天王之宝藏”。这就是《一千零一夜》书中水手辛巴德（Sindbad The Sailor）的故事，云沙漠中有一深谷，满积宝石，四周为绝壁，人不能上下，取宝者杀羊剥皮，投入谷中，大鹰入谷叼羊，肉上粘着的宝石即被带上。这个故事，公元三世纪时已在希腊、罗马广泛流传。传来中国后，文人把它当成纪事，定在梁武帝时，又跟“色界天王”这样的佛教名词扯在一起，弄得亦真亦假，神秘离奇。

又如唐人段公路《北户录》中的一则：“拂林国有地生羊，其羔生土中，国人筑墙围之，脐与地连，割之则死，但走马击鼓以骇之，惊鸣脐绝，便逐水草。”这也是伏尔加河和里海一带的民间故事。传入中国后，唐人把它和真人真事混为一谈，宋代修新旧《唐书》都予以收入，《本草纲目》也将其列为专条，真是“假作真时真亦假”了。

史书中类似的东西还很多，如“有一鸟似鹅，其毛深绿，常在王边，倚枕上坐。每进食，有毒，其鸟辄鸣。”（《旧唐书》）“小人（国），在大秦之南，躯才三尺。其耕稼之时，惧鹤所食，大秦每卫助之。”（《通典》）

这些材料，在对神话和民俗进行比较研究时是十分有用的，但是拿来当作关于外国的实际知识，那就完全不行了。

x

x

在漫长的历史上，中国也有过旅行家，写过一些亲身经历的游记。如东汉班勇的《西域风土记》，孙吴朱应的《扶南异物志》和康泰的《外国传》，唐代杜环的《经行记》，等等。他们的行踪虽然并没有超出亚洲范围，但是毕竟从中国向西走了很远，一定听到了不少关于欧洲的事情。可惜这些书大都散佚了。

只有杜环的《经行记》，在《通典》中还保存着很少几条。其记拂菻国云：“其人颜色红白，男子悉着素衣，妇女皆服珠锦。好饮酒，尚干饼。”“其俗七日一假，不买卖，不出纳，惟饮酒，谑浪终日。”这里所说人的肤色

白中透红，男人穿单色衣，妇女好装饰，喜欢喝酒，多吃面包、饼干，每七天休息一天，休息游乐等等，确实是东罗马帝国的实际情形。

还有一些人虽然没有旅行去外国，但有机会亲自接触来中国的外国商人和使节，他们的记载也是比较真实可信的。如：唐代裴矩《西域图记序》（全书已佚，只留下一篇序），记录了中国通罗马的三条商路。宋代周去非《岭外代答》，记大秦国王每七天到礼拜堂做礼拜。宋代赵汝适《诸蕃志》，记斯加里野（意大利语“西西里”的读音）有火山，爆出石块如浮石。这些记载，也和欧洲实际情况相符。

至于玄奘、法显、慧超等佛教僧徒的出国记传，主要是记印度佛教的事情，偶尔涉及拂懔、拂临，也多属传闻，而且十分简略。

x

x

蒙古人武力征服欧亚，是中西交通史上的一大变化。蒙古人和色目人（包括欧洲人）一度可以在亚欧大陆上通行无阻。西方的“中世纪四大旅行家”，都有关于中国的

旅行记传世，尤以马可·波罗最为著名。中国的汪大渊、杨枢、常德、刘郁等人，也旅行到了西亚。汪氏的《岛夷志略》和刘氏的《西使记》所讲到的“佛朗国”（“富浪国”），就是法兰克王国的波斯读音，是波斯人对欧洲的泛称。

明朝消灭蒙古贵族对“汉人”、“南人”的统治和歧视以后，中国与西洋、南洋的交通进入了一个新时期。“三宝太监下西洋”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大事。参加这次远航的人的亲历记，流传下来了即有巩珍《西洋番国志》、费信《星槎胜览》、马欢《瀛涯胜览》等好几种。紧接着新航路的发现，佛朗机人（葡萄牙人）和红毛夷人（荷兰人）大举东来。中国人关于欧洲的记载，也开始比过去增多而充实了。如《皇明世法录》、《殊域周咨录》记佛朗机人：

婚娶论财，责女奁货数倍。无媒妁，诣佛前相配，以僧为证，谓之交印。国有大故，亦多与僧谋。（此处“佛”指天主，“僧”指教士。）

每船二百人撑架，橹多人众，虽无风可以疾走。各銃举发，弹落如雨。其銃管用铜铸造，大者一千馀斤。